

中俄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合作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王志琛

【内容提要】 中俄两国首脑在联合声明中多次提到要加强在联合国安理会内的协调与合作。投票凝聚力指数（IVC）可以作为评价两国在联合国安理会合作的指标。整体上看，中俄在安理会的凝聚力高于冷战刚结束时的情况，但是2010年后出现了微妙变化，中国在俄美之间呈现“摇摆”状态。从2011年开始，中俄的投票凝聚力指数连续4年下降。关于中俄安理会合作的影响因素，本文提出以下假设：（1）中俄在安理会的合作与中俄双边关系的友好程度正相关；（2）中俄在安理会的合作与中俄不断拉大的实力差距负相关；（3）中俄在安理会的合作与议案所涉及国家的地理位置有关。经过一系列量化和建模操作后，假设1、2通过了模型1的检验，假设3通过了模型2的检验。

【关键词】 联合国安理会 投票凝聚力指数 IVC 中俄关系 相对实力

【作者简介】 王志琛，黑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国际关系专业硕士研究生。

1992年至2015年，中俄首脑共发表26次联合声明，其中有12次明确提出要加强两国在联合国内的协调与合作^①。尤其在2007年3月26日的联合声明中，两国首脑强调，双方在联合国框架内的成功合作充分实现了中俄两国利益，即加强联合国及其安理会在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方面的中心地位。安理会是联合国的

* 本文为第二届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前沿论坛优秀论文。作者根据匿名审稿人和评审专家提出的意见对本文进行了修改，在此一并致谢，但文责自负。

① 26次中俄首脑联合声明分别为：1992、1994、1996、1998、1999、2000、2001、2002、2003、2004、2005、2006、2007、2008、2009、2012、2013、2014年每年各1次，1997、2010、2011、2015年每年各2次。提及加强在联合国内的合作有10次，分别为：1992、1996、1997、2002、2003、2004、2006、2007、2011（2次）、2014、2015年。声明全文详见中国外交部官网：http://www.fmprc.gov.cn/web/ziliao_674904/1179_674909/

重要机构，《联合国宪章》赋予安理会在国际关系中至高无上的法律权威。安理会垄断了国际等级体系中合法使用武力的权力，能够对国家产生约束力，并且代表联合国所有成员采取集体行动，这种军事和政治权威在国际政治中无可比拟^①。那么，中俄在联合国安理会中的合作究竟如何？中俄在安理会的合作是双方在联合国框架内合作重要组成部分，本文拟通过考查中俄在安理会中投票的一致程度，分析两国在安理会中合作的总体情况。

一 投票凝聚力指数 (IVC)

最早提出如何计算两国在联合国中投票相似度的是著名政治学家阿伦·利普哈特 (Arend Lijphart)。1963年，在赖斯—贝尔 (Rice - Beyle) 关于立法机构成员投票一致指数计算方法的基础上，利普哈特作了一定修改，使之符合国家在联合国中的情况，因为联合国的投票，不仅有赞成票和反对票，还有弃权票。他提出了 A - B 两国投票一致指数 IA (Index of Agreement) 的计算公式：^②

$$IA = \frac{f + \frac{1}{2}g}{t} \times 100\%$$

t: A - B 两国参与的总投票数

f: A - B 两国完全一致的投票数，即都是赞成票、反对票或者弃权票

g: 一国弃权，另一国反对或赞成的票数

库尔·拉伊 (Kul Rai) 分析 1965 年苏联—萨尔瓦多和美国—摩洛哥两组国家在联大投票相似情况后认为，李帕特的 IA 公式要优于海沃德·阿尔克 (Hayward Alker) 和布鲁斯·拉西特 (Bruce Russett) 的计算公式，理由是 IA 在反应部分一致的投票时更加准确。^③

1975 年，里昂·赫维兹 (Leon Hurwitz) 提出投票凝聚力指数 IVC (Index of Voting Cohesion) 公式。他用 IVC 替代了李帕特公式中的 IA，其他部分保持不

^① Ian Hurd, "The UN Security Council and the International Rule of Law",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2014, Vol. 7, No. 3, p. 362.

^② Arend Lijphart, "The Analysis of Bloc Voting in The General Assembly: a Critique and a Proposal",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963, Vol. 57, No. 4, p. 910.

^③ Kul Rai, "Lijphart's IA and Pearson's r for Studying UN Voting",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1974, Vol. 6, No. 4, p. 515.

变, 即 $IVC = \frac{f + \frac{1}{2}g}{t} \times 100\%$ 。赫维兹认为, 投票一致指数 IA 可能会产生错误的暗示, 即它是测量两国就某些待检验议案投赞成票频率的工具, 投票凝聚力指数 IVC 被用来避免这种误解, 凝聚力是指两国用相同方式投票 (可以都是赞成票、反对票, 或者弃权票) 的程度^①。实际上, IA 的称法还带有早期议会政治痕迹, IVC 更贴近于国际政治或国际关系的概念。

2005 年, 西蒙·希克斯 (Simon Hix) 等学者提出测量党派凝聚力的新方法——AI (Agreement Index) 公式, 他们用这一公式分析了欧洲议会中各政党团体的形成及其原因, AI 公式可表达为^②:

$$AI = \frac{\max\{Y, N, A\} - \frac{1}{2} [(Y, N, A) - \max\{Y, N, A\}]}{(Y, N, A)}$$

(Y, N, A) 表示在一次给定的投票中, 各成员投赞成票、否决票和弃权票的总和; Max {Y, N, A} 表示在一次给定的投票中, 投票结果占最多的那一种情况, 即赞成票、否决票或弃权票的一种。

通过计算里斯本条约前后欧盟各成员国在联大投票 AI 数值的变化, 金熙 (Xi Jin) 和玛德琳·霍斯利 (Madeleine Hosli) 指出, 欧盟整体上投票一致程度在上升, 但里斯本条约后比里斯本条约前的投票一致程度上升得并不明显^③。

2010 年, 霍斯利等学者发现, 尽管投票凝聚力指数 IVC 的计算公式精确而简约, 但是当遇到像联合国这样成员国众多的国际组织时, 计算量非常巨大, 因此他们改良了计算方法, 把赞成票计为 1 分, 否决票计为 0 分, 弃权票计为 0.5 分, 提出凝聚力指数 CI 的计算公式^④, 即

$$CI = AV_x - 0.5 \quad \times 2 \times 100$$

AV_x 表示对某个草案 x 投票的平均得分。

^① Leon Hurwitz, "The EEC in The United Nations: The Voting Behaviour of Eight Countries, 1948 - 1973",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1975, Vol. 13, No. 3, p. 228.

^② Simon Hix, Abdul Noury, Gérard Roland, "Power to the Parties: Cohesion and Competition in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1979 - 2001",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005, Vol. 35, No. 2, p. 215.

^③ Xi Jin, Madeleine Hosli, "Pre - and Post - Lisbon: European Union Voting in the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West European Politics*, 2013, Vol. 36, No. 6, pp. 1274 - 1291.

^④ Madeleine Hosli, Evelyn van Kampen, Frits Meijerink, Katherine Tennis, "Voting Cohesion in the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The Case of the European Union", *The ECPR Fifth Pan - European Conference*, 24 - 26 June 2010, Porto, pp. 17 - 18.

2013年,彼得·费迪南(Peter Ferdinand)分别使用AI、CI和IVC三种计算方法对亚太国家在联大的投票情况进行了研究。他发现,AI和CI的结果存在细微差别,二者与IVC的结果差别稍大一点,但总体上看三种指标计算的结果是高度吻合的,图形的走势也是相似的^①。2014年,尼古拉斯·布尔梅斯特(Nicolas Burmester)和迈克尔·扬科夫斯基(Michael Jankowski)重新评估欧盟在联大中的投票情况时,对IVC的计算公式进行了较大改变,使之在计算多个成员国之间的投票凝聚力时更加简化^②。他们与李帕特和赫维兹的IVC计算方法有明显区别,因为根据IVC原始公式,在计算多个成员国之间的投票凝聚力指数时,需要计算各个成员国双边数值,然后再求平均值,这个过程是非常耗时的,尤其是当某一组织或集团的成员国数量众多时。

由于本文研究对象是中俄两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P2),在研究过程中会涉及其他三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P3),研究对象数量总共不超过5个,因此,在综合比较各个指标与计算方法的优缺点后,本文选用李帕特和里昂·赫维兹的

IVC计算公式($IVC = \frac{f + \frac{1}{2}g}{t} \times 100\%$)进行投票行为的研究,这样既可以最大程度保证数据的准确性,又可以避免IVC在应对成员国数量过多时计算量过大的缺点。

二 中俄安理会合作情况总体描述

1991年12月底,俄罗斯继承苏联在联合国的席位,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从1992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的24年里,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案1534件,被否决的决议草案30件,共计1564件,这些议案的详细投票情况可以在哈马舍尔德图书馆和联合国的官方网站上查询^③。利用前文提到的李帕特和赫维兹的IVC公式,并且把不参加投票的情况都当作弃权票处理(冷战后安理会很

^① Peter Ferdinand, "Foreign Policy Convergence in Pacific Asia: The Evidence from Voting in the UN General Assembly", *The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013, Vol. 16, No. 4, p. 667.

^② Nicolas Burmester, Micheal Jankowski, "Reassessing the EU in the UN General Assembly", *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 2014, Vol. 21, No. 10, p. 1497.

^③ 哈马舍尔德图书馆官网: <http://www.un.org/Depts/dhl/index.html>; 被否决的决议草案详见联合国官网: <http://www.un.org/zh/sc/meetings/veto/>

少发生这种情况)。笔者分别计算了中俄、俄美、中美和美英法等国的投票凝聚力指数，如表 1 所示。

表 1 中俄、俄美、中美和美英法等国的投票凝聚力指数

年份 \ 国家	中俄 IVC (%)	俄美 IVC (%)	中美 IVC (%)	美英法 IVC (%)
1992	93.92	100.00	93.92	100.00
1993	96.81	97.87	96.81	100.00
1994	95.51	96.79	96.15	99.57
1995	96.27	94.03	96.27	99.00
1996	98.25	95.61	95.61	99.42
1997	95.61	95.61	92.98	97.66
1998	99.32	98.63	97.95	100.00
1999	96.97	96.21	94.70	98.99
2000	97.00	98.00	97.00	99.33
2001	100.00	95.37	95.37	97.53
2002	99.29	95.71	96.43	97.62
2003	100.00	96.38	96.38	96.62
2004	97.58	93.55	94.35	97.31
2005	99.30	98.59	99.30	99.53
2006	100.00	96.07	96.07	98.50
2007	97.37	94.74	97.37	100.00
2008	100.00	97.73	97.73	99.49
2009	97.96	96.94	96.94	99.32
2010	98.31	99.15	99.15	99.44
2011	100.00	95.59	95.59	99.02
2012	99.09	94.55	95.45	100.00
2013	97.87	97.87	100.00	100.00
2014	96.97	93.18	96.21	98.99
2015	95.45	93.18	97.73	100.00

从表 1 中不难看出，常任理事国之间的投票凝聚力指数都超过了 90%。这表明冷战结束后，安理会在绝大多数议案上都能达成一致意见，大国之间虽然存在分歧，但依然保持较高的合作水平。其原因是，与冷战期间两极对抗导致安理会几近瘫痪相比，冷战结束后一超多强的力量结构明显带来了较多的磋商和协调，大国之间和所有国家之间在联合国的合作明显增多^①。下面就中俄、俄美、中美和美英法等国的投票凝聚力指数展开具体分析。

（一）中俄与俄美、中美投票凝聚力指数的对比

中俄美三边关系中，哪两边在安理会的立场更为相似、联系更加紧密？这点可以通过分析双边投票凝聚力指数的差值得出答案。在 A、B、C 三国中，如果 $IVC_{(AB)} > IVC_{(AC)}$ ，即 $IVC_{(AB)} - IVC_{(AC)} > 0$ ，表示 AB 之间的团结程度大于 AC，A 国更加偏向于 B 国，反之则 AB 之间的团结程度小于 AC，A 国更加偏向于 C 国；如果 $IVC_{(AB)} = IVC_{(AC)}$ ，即 $IVC_{(AB)} - IVC_{(AC)} = 0$ ，则表明 A 国居于 BC 中间，没有明确的立场偏向。

中、俄、美三国分别用 A、B、C 表示，中俄与俄美投票凝聚力指数的差值可表示为 $\Delta IVC_{(B)} = IVC_{(AB)} - IVC_{(BC)}$ 。利用表 1 的数据，绘制 $\Delta IVC_{(B)}$ 的条形图，如图 1 所示；同理，中俄与中美投票凝聚力指数的差值可表示为 $\Delta IVC_{(A)} = IVC_{(AB)} - IVC_{(AC)}$ ，利用表 1 的数据，绘制 $\Delta IVC_{(A)}$ 的条形图，如图 2 所示。

从图 1 中可以清楚看到，1992 年至 1994 年， $\Delta IVC_{(B)} < 0$ ，表明此阶段中俄的紧密程度低于俄美的紧密程度，俄罗斯的立场更加偏向于美国，这与我们对俄罗斯独立初期外交政策的认知是相符的。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奉行亲西方的“一边倒”外交，在国际问题上与美国保持一致，但是随着俄罗斯采取东西并重的全方位外交政策后，这种情况很快发生了改变。从 1995 年到 2015 年，除少数年份（2000、2010 年）外， $\Delta IVC_{(B)}$ 的值均大于（或等于）零，中俄的紧密程度大于俄美。另外，从图 1 中还可以发现，普京担任总统时的 $\Delta IVC_{(B)}$ 值整体上要高于叶利钦和梅德韦杰夫时期，也就是说，与这两位总统相比，普京的立场更显得“亲中反美”。

^① 朱立群《联合国投票变化与国家间关系（1990~2004）》，载《世界政治与经济》2006年第4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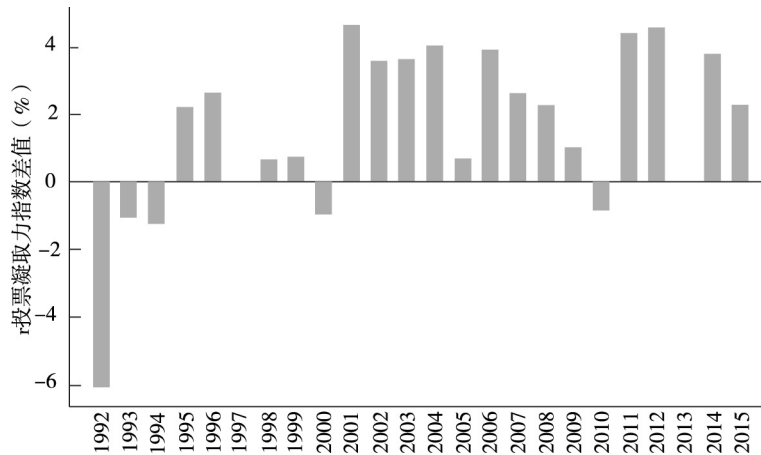


图 1 中俄与俄美投票凝聚力指数差值 $\Delta IVC_{(B)}$ 逐年变化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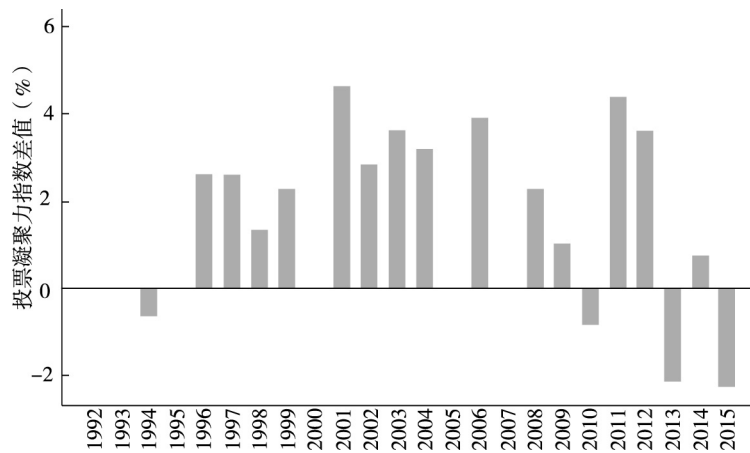


图 2 中俄与中美投票凝聚力指数差值 $\Delta IVC_{(A)}$ 逐年变化图

上文分析了俄罗斯在中美之间的站队情况，那么，中国在俄美之间是如何选边站？1992 年至 1994 年，俄美保持高度一致的时候， $\Delta IVC_{(A)}$ 保持为零（1992、1993 年）和微弱的负值（1994 年），表明该阶段中国在俄美之间总体保持平衡，但微弱亲美。从 1995 年至 2009 年， $\Delta IVC_{(A)}$ 始终处于大于零（少数年份等于零）的状态，表明在该阶段中俄比中美更为紧密，中国的立场更加偏向俄罗斯。但是，从 2010 年开始，情况发生了微妙变化， $\Delta IVC_{(A)}$ 正值和负值交替出现。截至

2015年，三年正值三年负值，说明中国在俄美之间处于“摇摆”状态，这似乎与我们对当前中俄关系的认知不符。图1显示，2010年以后 $\Delta IVC_{(B)}$ 基本大于零（2013年等于零）而且数值较大，表明在中美之间，俄罗斯坚定地站到了中国一边，与美国的分歧较为严重。

综上可知，中俄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合作可分为三个阶段：1992年至1994年，俄美表现亲密，中国与俄美保持距离；1995年至2009年，中俄维持了一个长达15年的紧密状态；2010年至2015年，情况趋于复杂，俄罗斯依然与中国保持立场一致，中国在俄美之间处于“摇摆”状态。2010年，美国高调宣布“重返亚太”后，专家和媒体普遍认为中俄两国应该抱团取暖，共同应对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然而，从中俄美三国安理会投票情况看，并不完全支持这种判断。实际情况是，俄罗斯在坚定反美，而中国在左右摇摆。不过，也应该指出，这只是在安理会中的短期情况，后续情况还有待观察。

（二）中俄与美英法投票凝聚力指数的对比

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中一直存在P2与P3的提法，即东方国家中俄（P2）为一方，西方国家美英法（P3）为另一方。尤其是叙利亚危机中，西方媒体和学者普遍鼓吹中俄形成的“否决联盟”造成了安理会的分裂^①。费迪南在2014年的论文中计算了安理会五常（P5）在联大的投票一致指数（AI）。根据他的数据，中俄与美英法是分裂的，并且中俄在联大的投票一致程度略高于美英法^②。那么，P2与P3在安理会的情况究竟如何？根据表1的投票凝聚力指数，笔者绘制了P2与P3投票凝聚力指数差值 $\Delta IVC_{(EW)}$ 的条形图（图3）以及P2与P3投票凝聚力指数的曲线图（图4）。

如图3所示，冷战结束后的24年里，有17年时间 $\Delta IVC_{(EW)}$ 都小于零且绝对值较大，说明P2在安理会的凝聚力低于P3，且差距较大。P2投票凝聚力指数胜出的年份有7次，其中有6次发生在2001年至2008年，这正好是美国前总统小布什执政时期，小布什奉行的单边主义让西方社会陷入严重分裂。不过在克林顿和奥巴马执政时期，安理会中P3还是相对团结的，它们投票的一致程度明显高于P2。

^① Christo Odeyemi, “Re-emerging Powers and the Impasse in the UNSC over R2P Intervention in Syria”, *Strategic Analysis*, 2016, Vol. 40, No. 2, pp. 122-149.

^② Peter Ferdinand, “Rising powers at the UN: an analysis of the voting behaviour of BRICS in the General Assembly”, *Third World Quarterly*, 2014, Vol. 35, No. 3, p. 38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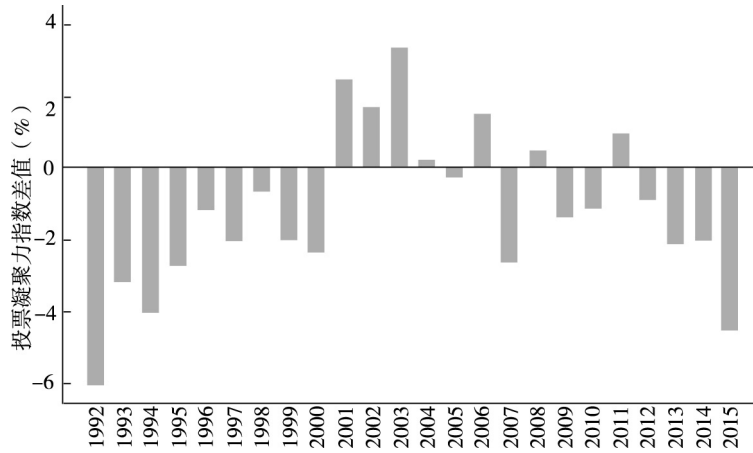


图 3 中俄 (P2) 与美英法 (P3) 投票凝聚力指数差值 $\Delta IVC_{(EW)}$ 逐年变化图

图 3 中发现的特点和规律,也可以在图 4 中得到佐证。P3 的 IVC 曲线图基本呈现“U”形,而 P2 的 IVC 曲线图基本呈现“M”形,“U”形底部和“M”形顶部发生的年份基本是重合的,这表明美、法、英分歧最严重的那几年,也恰好是中俄立场最一致的那几年。从图 4 中我们还可以发现,P3 的 IVC 曲线图比较平滑,始终处于 96% 以上的高位,而 P2 的 IVC 曲线图波动很大,高时可以达到 100%,低时可以跌到 94% 以下。其主要原因在于,P3 拥有相似的政治体制、紧密的经济联系以及广泛的社会亲缘性,这些都是 P2 欠缺的,中俄两国还需要深挖合作基础,而不能只靠政府或领导人之间的友好关系。最后需要警惕的是,当西方媒体不断炒作中俄形成了“否决联盟”以及我们自认为“中俄关系处于历史最高水平”时,而实际上,2011 年以后中俄在安理会的凝聚力指数连续 4 年下降,2015 年跌至历史第二低,仅略微高于 1992 年的水平,这一反常现象应该引起官方和学术界的高度重视 (见图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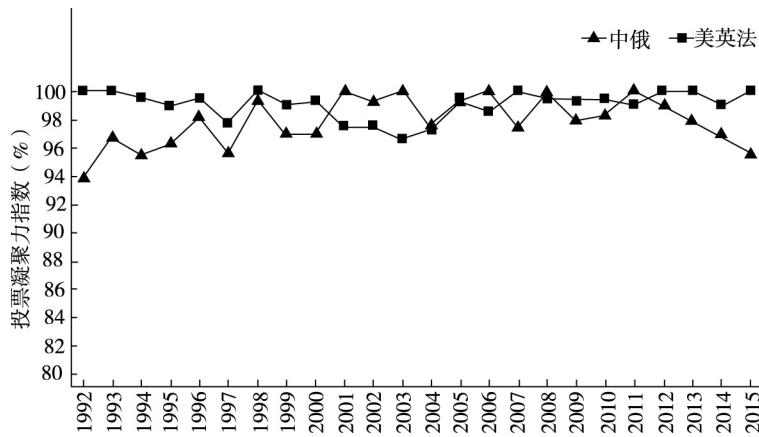


图4 中俄 (P2) 与美英法 (P3) 投票凝聚力指数 IVC 逐年变化图

三 中俄安理会合作的影响因素

(一) 提出假设

本文无意于穷尽影响中俄安理会合作的所有因素，本着能够进行量化操作和定量研究的原则，提出影响中俄安理会合作的三个假设。

假设 1: 中俄在安理会的合作与中俄双边关系的友好程度正相关，即双边关系越友好，越有利于两国在安理会的合作。

在后冷战时期，中俄关系不断发展，两国在安理会中的合作也逐步加深。在王文看来，中俄能够在联合国实现合作有三大理由，其中之一就是中俄关系经过 1992 年、1994 年、1996 年和 2002 年四个台阶的发展日益走向成熟和稳定，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已经结出政治、贸易、军事和民间交往的丰硕成果^①。2011 年，中俄两国又达成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几乎离结成同盟也只差一步之遥。得益于这种稳步递进的双边关系，中俄安理会合作也在不断加强。2014 年 9 月，中国外长王毅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参加联合国第 69 届大会时举行会晤，对两国在联合国及其他国际机制框架下的协调和相互协作水平感到满意。

假设 2: 中俄在安理会的合作与两国不断拉大的实力差距负相关，即俄罗斯

^① 王文 《冷战结束后联合国机制内的中俄合作关系》，载《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04 年第 4 期。

与中国的实力差距越大，越不利于双方在安理会的合作。

中俄不断拉大的实力差距会对两国在安理会的合作造成两方面的负面影响。首先，随着相对实力的衰落，俄罗斯在中国外交战略中的重要性会减弱，并且在中俄美三边关系中有被边缘化的风险，这是一直把大国地位当成自己首要目标的俄罗斯所不能接受的。其次，随着中国实力的不断增强，俄罗斯对中国的疑惧增加。面对中国崛起，俄罗斯一面是战略上的利益借重，一面是心理上的疑虑恐惧，表现出二律背反的复杂心态，双方既借重又怀疑，既合作又防范，呈现出在防范中合作的特点^①。俄罗斯国内也一直存在“中国威胁论”的声音，这不利于两国的互信与合作。

假设3：中俄在安理会的合作与议案所涉及国家的地理位置有关，即涉及边远地区的问题，双方越容易达成一致意见，反之越难达成一致意见。

联合国安理会作为应对国际安全问题最权威机构，绝大多数议题都是针对具体国家的。笔者基于地缘政治的考虑并认为，如果该议案所针对的国家距离中俄较远，则中俄双方的分歧较小或者较易协调，可以较容易地就该议案达成一致意见，反之如果距离较近，则双方的分歧较大或者较难协调，很难就该议案达成一致意见。地缘政治既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国际关系实践，也决定了这个国家国际关系的概念和理论^②。应该说，像中俄这种国土面积广阔，拥有漫长共同边界，而且实力强劲的国家，无论双边关系多么友好，相互依赖多么牢固，免不了都存在地缘政治的竞争。在俄罗斯的亚太地缘战略中，由于中国与俄罗斯在地缘上接壤，且冷战后中国的综合国力提升迅速，因此俄罗斯在地缘战略设计时一直将中国视为东部方向潜在对手^③。在中亚地区，随着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俄罗斯的神经也处在紧绷状态，怕失去自己的“后院”。

（二）量化与建模

对于自变量中俄双边关系友好程度的评估，本文采用的是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创建的中外关系数据库^④。该数据库是迄今为止国内唯一专门为国际关系研究而建立的数据库，它对中国与其他国家双边关系的追踪时间较长（从

^① 吴大辉 《防范中的合作——俄罗斯关于中国和平崛起的心理图解》，载《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05年第5期。

^② 郑永年 《边疆、地缘政治和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载《外交评论》2011年第6期。

^③ 徐博 《冷战后俄罗斯亚太地缘战略研究》，吉林大学博士论文2013年，第217页。

^④ 中外关系数据库下载地址：<http://www.imir.tsinghua.edu.cn/publish/iis/7522/index.html>，该数据库免费且定期更新，下载日期为2016年6月16日。

1950 至今), 评估方法科学准确, 评估结果值得信赖。该数据库创始人之一阎学通介绍说, 他们设计定量衡量双边关系的方法, 最直接的目标是使双边关系的赋值合理, 但最根本的目的还是为研究双边关系提供一个新的工具, 从而使研究人员可以更加深刻地认识双边关系, 得出更加符合客观实际情况的判断^①。该数据库的中外关系分值在 (-9, 9) 之间, -9 表示敌对, 9 表示盟友, 分值越高, 双边关系越友好。本文选取一年 12 个月的平均值作为该年中俄双边关系的分值。

对于自变量中俄相对实力的评估, 本文采用的是中国国民生产总值 (GDP) / 俄罗斯 GDP 的比值。目前, 国际关系学界对国家实力既无权威定义, 也无权威数据库。受 1987 年日本综合研究所出版的《日本的综合国力》一书影响, 以王涌芬、黄硕风为代表的学者开展了对综合国力的研究, 并取得了一定成果^②。遗憾的是, 在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后, 并没有建成关于综合国力的数据库。国外关于国家实力的数据库主要有两个: 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 (IMD) 的《世界竞争力年鉴》和战争相关因素数据库 (COW) 中的国家物质能力数据集 (National Material Capabilities Data)^③。《世界竞争力年鉴》从 1989 年开始, 到最新的 2016 年版都可以在 IMD 官网上购买, 但是价格不菲, 不利于学者的广泛使用。COW 是国际关系领域极其重要的数据库, 其包括多个方面的数据, 都免费下载和使用, 具有追踪时间长 (从 1816 年开始)、覆盖范围广 (包括战争、宗教、经济等多个领域) 等优点, 然而, 国家物质能力数据集最新版 (第 4 版) 的数据只更新到 2007 年, 与本文研究的时间段 (1992 ~ 2015 年) 不符。在缺乏国家实力数据库的情况下, 本文选择用 GDP 作为评价国家实力的指标, 这一做法也是目前中外学者广泛使用的^④。实际上, 由于本文的自变量是中俄的相对实力, 即用中国 GDP/俄罗斯 GDP 的比值来衡量两国的实力差距, 并不要求中俄绝对实力的数据, 因此用 GDP 作为评价国家实力的指标是可以满足研

① 阎学通、周方银《国家双边关系的定量衡量》, 载《中国社会科学》2004 年第 6 期。

② 代表性的著作有王涌芬《世界主要国家综合国力比较研究》; 黄硕风《大国较量: 世界主要国家综合国力比较》; 代表性的研究报告有: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世界主要国家综合国力比较研究》课题组和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综合国力课题组公布的研究报告。

③ 《世界竞争力年鉴》的介绍和购买请见 IMD 官网: <http://www.imd.org/wcc/wcy-world-competitiveness-yearbook/>; 战争相关因素数据库 (COW) 的下载地址: <http://cow.la.psu.edu/>

④ 研究投票行为用 GDP 作为评价指标的论文可以参见: 漆海霞、张佐莉《弃权还是否决——中国如何在安理会投票中表达反对立场》; Niklas Potrafke, “Does government ideology influence political alignment with the U. S.?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voting in the UN General Assembly”; Axel Dreher, Nathan Jensen, “Country or leader? Political change and UN General Assembly voting”; Wonjae Hwang, Amanda Sanford, Junhan Lee, “Does Membership on the UN Security Council Influence Voting in the UN General Assembly?”

研究需要的。本文使用的 GDP 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中国 GDP 的数值仅包括中国大陆^①。

对于自变量安理会议案所涉及国家地缘距离的评估，本文采用的是法国国际信息和展望研究中心（CEPII）的地缘距离数据库（The GeoDist Database）^②。该数据库常被经济学家用于计算双边贸易流动的吸引力方程，政治学专家者也用距离和毗连数据（与其他决定因素一起）来解释为什么某些国家发生战争的可能性要高于另外一些国家^③。该数据库将国家间距离分为两大类四小类：简单距离（Simple distances，包括 dist 和 distcap）以及加权距离（Weighted distances，包括 distw 和 distwces）。本文选取的是简单距离项下的 dist，它利用两国最重要城市（主要是首都，少数情况是人口最多城市）的经纬度来计算两国的距离，单位为千米。具体到本文研究，地缘距离 dist 即为安理会议案所涉及国家的最重要城市与北京或莫斯科的距离（取较近的一方）。由于数值较大，对其取以 10 为底的对数，即地缘距离 $distance = \log (dist)$ 。本着最小舍弃样本数据的原则，本文对 1992 年至 2015 年安理会总共产生的 1 564 件议案作了如下处理：（1）关于国际社会准则（如保护妇女儿童、防止核生化武器扩散、多瑙河航行自由等）、一般性宣言（如谴责、制裁、打击恐怖主义等）和联合国机构议程设置（如秘书长人选、成立和平委员会等）的议案，以及所有涉及国际法庭（包括其开设的特别法庭）的议案，由于不能化约到具体国家（特别法庭有时会涉及具体国家，但也是处理大规模犯罪、种族灭绝等一般性国际准则问题），只能舍去；（2）所有涉及中东局势的议案，如不特别指明国家，均以以色列计，所有涉及非洲大湖地区局势的议案，如不特别指明国家，均以卢旺达计；（3）如果议案涉及多个国家，以面积最小的国家计，如果议案涉及国家和地区，以国家计；（4）由于 CEPII 的地缘距离数据库不包括摩纳哥公国和南苏丹共和国，它们的首都与北京和莫斯科的距离数据来自世界距离计算网站（World Distance Calculator）^④，该网站也是根据城市的经纬度来计算两者之间的距离。经过上述处理后，总共保留了

① 中俄 GDP 数据下载地址：<http://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NY.GDP.MKTP.CD?view=chart>，下载日期为 2016 年 6 月 16 日。

② CEPII 的地缘距离数据库（The GeoDist Database）下载地址：http://www.cepii.fr/CEPII/en/bdd_modele/presentation.asp?id=6，下载日期为 2016 年 6 月 16 日。

③ Thierry Mayer, Soledad Zignago, “Notes on CEPII’s distances measures: The GeoDistdatabase”, Form The GeoDist Database, p. 7.

④ 世界距离计算网站（World Distance Calculator），http://distancecalculator.globefeed.com/World_Distance_Calculator.asp

1396 件议案，占安理会议案总数 89.3%，可以看出，样本容量依然非常大，且具有代表性。

表 2 对模型 1 和模型 2 的整体描述

			量化操作	样本量	时间段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标准差
模型 1	自变量	中俄关系友好程度	中俄关系分值	1 564	1992 ~ 2015	2. 97	8. 10	6. 98	1. 57
		中俄相对实力	中国 GDP/俄罗斯 GDP	1 564	1992 ~ 2015	0. 92	8. 29	3. 55	1. 64
	因变量	中俄安理会合作	投票凝聚力指数 IVC	1 564	1992 ~ 2015	93. 92	100. 00	97. 87	1. 74
模型 2	自变量	安理会议案所涉及国家的地理位置	该国最重要城市距北京或莫斯科的地缘距离，取以 10 为底的对数	1 396	1992 ~ 2015	2. 8828	4. 0406	3. 5968	0. 25
	因变量	中俄安理会合作	投票一致计为 1，不一致计为 0	1 396	1992 ~ 2015	0	1	-	-

从上述量化操作的过程可以看出，自变量中俄关系友好程度和自变量中俄相对实力都是时序数据，因变量中俄安理会合作同样选取时序数据——投票凝聚力指数（IVC）。在以上变量基础上建立模型 1。自变量地缘距离是考察单个议案的，在因变量的操作上，如果中俄在该议案上投票一致（都是赞成票、否决票或弃权票）计为 1，剩下的形式（一方反对另一方赞成、一方弃权另一方赞成或反对）都是投票不一致的情况，计为 0，建立自变量地缘距离和因变量投票是否一致的模型 2。对模型 1 和模型 2 的描述见表 2。

（三）结果与讨论

模型 1 的因变量和自变量都是连续变量，运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对其进行线性回归；模型 2 的因变量是虚拟变量，自变量是连续变量，对其进行 Logistic 回归。本文使用的分析软件为 Stata12.0，模型 1 和模型 2 的回归结果见表 3 和表 4。

表 3 模型 1 的回归结果

```
.regress IVC relation power
```

Source	ss	df	MS			
Model	40.6952979	2	20.3476489	Number of obs	=	24
Residual	28.5181879	21	1.35800895	F (2, 21)	=	14.98
Total	69.2134858	23	3.00928199	Prob>F	=	0.0001
				R-squared	=	0.5880
				Adj R-squared	=	0.5487
				Root MSE	=	1.1653

IVC	Coef.	Std. Err.	t	p> t	[95% Conf. Interval]	
relation	1.139632	.2113539	5.39	0.000	.7000975	1.579167
power	-.6014232	.2025307	-2.97	0.007	-1.022609	-.1802375
_cons	92.0474	1.144513	80.42	0.000	89.66726	94.42755

如表 3 所示，IVC 即投票凝聚力指数，表示因变量中俄安理会合作，relation 表示自变量中俄关系友好程度，power 表示自变量中俄相对实力。从表 3 可以看出，t 的绝对值都大于 2，且 p 值都小于 0.01，拟合优度 $R^2 = 0.5880$ ，说明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有较强的相关性。自变量中俄关系友好程度的系数为 $1.139632 > 0$ ，表明该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是正相关，即中俄双边关系越友好，越有利于双方在安理会的合作；自变量中俄相对实力的系数为 $-0.6014232 < 0$ ，表明该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是负相关，即中国与俄罗斯的实力差距越大，越不利于双方在安理会的合作。可见，本文提出的假设 1 和假设 2 都通过了模型 1 的检验。

表 4 模型 2 的回归结果

```
.logistic agreement distance
```

Logistic regression	Number of obs	=	1396
	LR chi2 (1)	=	19.04
	Prob>chi2	=	0.0000
Log likelihood=-228.6051	Pseudo R2	=	0.0400

agreement	Odds Ratio	Std. Err.	z	p> z	[95% Conf. Interval]	
distance	10.98293	6.155191	4.28	0.000	3.661655	32.9427
_cons	.0049829	.009697	-2.72	0.006	.0001099	.2259351

如表 4 所示，agreement 表示因变量投票是否一致，distance 表示自变量地缘距离。从表 4 中可知，z 值大于 2，且 p 值小于 0.01，说明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具有相关性。OR 值为 $10.98293 > 1$ ，表明随着自变量地缘距离的增大，因变量 agreement = 1

(投票一致)发生的概率显著增大,即安理会议案所涉及国家的地理位置越远,中俄双方越容易达成一致意见,本文提出的假设3通过了模型2的检验。

由此可见,首先,双边关系友好对中俄在安理会的合作具有促进作用,不过随着中俄双边关系已经处于较高水平,这种促进作用在减弱。根据中外关系数据库显示,从2002年开始,中俄关系的分值一直维持在8.0的高位,上下波动幅度不超过0.2。中俄关系继续上升的空间有限,双方需要解决的是如何维持高水平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其次,中俄不断拉大的实力差距对双方在安理会的合作具有负面影响。中俄实力的消长变化是客观事实,既无法否认,也无法回避。中俄彼此视为亲密的伙伴,真诚地希望对方繁荣复兴,这种互信友好的氛围即使不能完全抵消,也能减弱因实力差距拉大而带来的负面作用。正如模型1所示,中俄高水平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可以抵消因相对实力变化对双方在安理会合作造成的不利影响。最后,地缘政治也是影响中俄安理会合作不可忽略的因素。中国所能做的是把地缘竞争控制在一个低烈度的合理范围内,在实际的外交政策中,需要考虑俄罗斯的核心关切和大国诉求,对俄罗斯传统的势力范围保持足够的尊重。

本文提出的假设和模型主要建立在互动和单位层次上,并没有专门探讨体系因素对中俄安理会合作的影响,主要原因是体系因素难于进行量化操作。此外,冷战后一超多强的国际格局并没有发生本质改变,中国的实力和国际地位虽然有了较大提升,但是还没有达到可以与美国平起平坐的水平,因此,在中短期内,可以把体系因素当作常数项处理。实际上,关于体系因素的探讨,本文第二部分有所涉及。冷战结束后,推动世界多极化、促进国际秩序的公平合理是中俄共同的追求,因此,有相当多的学者认为,中俄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合作是为了反对美国的单极霸权。这种观点忽略了一个基本的客观事实,冷战后安理会投票一致率始终处于较高水平,“五常”在绝大多数议案上都能达成一致意见,大国协调与合作仍然是安理会的主流。通过考察1984年至2005年中美在安理会和联合国大会1000多个议案的投票记录,戴颖和邢悦发现,冷战后在中美两国共同安全利益下降的情况下,中国并没有利用联合国安理会的投票机制制衡美国,进而破坏、阻碍美国的政策实施^①。中国对否决票的使用是非常谨慎的,即使不支持某项议案,中国也会优先选择与西方大国站在一起,从争论中获得相对较小的胜利^②。中国并未努力构建反美同盟,虽然中国与俄罗斯签订了友好条约,但把该

^① 戴颖、邢悦 《中国未在联合国对美国软制衡》,载《国际政治科学》2007年第3期。

^② Joel Wuthnow, "China and the Processes of Cooperation in UN Security Council Deliberations",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2010, Vol. 3, p. 65.

条约称为反美条约是荒谬的^①。联合国安理会本质上是大国协调、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地方，它不是、也不应该是大国的角斗场。

结 论

为了研究中俄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合作，本文系统梳理了衡量投票相似度的方法，综合考虑准确性和便利性等多方面因素后，决定使用投票凝聚力指数（IVC）对中俄安理会合作的情况进行分析。整体上看，中俄在安理会的凝聚力好于冷战刚结束时情况。在中俄美三边关系中，普京担任总统时中俄的紧密程度高于叶利钦和梅德韦杰夫时期。1992 年至 1994 年是俄美联系最紧密时期，双方在安理会的投票凝聚力指数高于中俄、中美的水平，中国被排斥在“俄美集团”之外；1995 年至 2009 年是中俄在安理会立场最一致、最团结的时期，中俄投票凝聚力指数保持了长达 15 年的高水平，美国被排斥在“中俄集团”之外；以 2010 年为分界点，情况出现了微妙的变化，俄罗斯继续“排斥”美国，而中国在俄美之间“摇摆”；从 2011 年开始，中俄投票凝聚力指数连续 4 年下降，这一现象值得关注。对比中俄（P2）与美英法（P3）的投票凝聚力指数，可以发现，除了小布什执政时期，P2 的凝聚力基本都弱于 P3 而且差距较大，说明中俄在联合国的协调还有进步空间，两国应该继续深挖合作的基础。

关于中俄安理会合作的影响因素，本文提出了三个假设：（1）中俄在安理会的合作与中俄双边关系的友好程度正相关，双边关系越友好，越有利于双方在安理会的合作；（2）中俄在安理会的合作与中俄不断拉大的实力差距负相关，俄罗斯与中国的实力差距越大，越不利于双方在安理会的合作；（3）中俄在安理会的合作与议案所涉及国家的地理位置有关，距离越远，双方越容易达成一致意见，反之越难达成一致意见。经过一系列量化操作后，本文设计了模型 1 和模型 2 来检验这三个假设，最终假设都顺利通过了检验。应该说，中俄不是安理会的阻碍者，而是安理会的守卫者，中俄将继续和西方三国一起，对安理会主导维护 21 世纪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方向拥有决定性的重大影响^②。

（责任编辑 王晨星）

^① 江忆恩 《中国对国际秩序的态度》，载《国际政治科学》2005 年第 2 期。

^② David Mickler, “China and Russia in the Post - Cold War UN Security Council: Obstructors or Sentinels of Global Security?”, The 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 Annual Convention, New York, February 15 - 18, 2009, p. 28.

however , reduces adjustment flexibility of Russia policy to the West and easily leads tough measures in foreign policy , such as using more military means and increasing the regional tension.

Sino – Russian Cooperation at Security Council at the UN and its influence

Wang Zhichen

Heads of China and Russia mentioned many times in joint statements to strengthen coordination and cooperation within Security Council of the United Nations. Vote cohesion index (IVC) can be used as evaluation index of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in Security Council of the UN. Overall , the cooperation cohesion between China and Russia in the Security Council is higher than that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 but after 2010 a subtle change appeared. China swings between Russia and America and China and Russia's vote cohesion index dropped for 4 years in a row. Concerning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Russia within the Security Council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following assumptions: (1) there is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Sino – Russian cooperation in the Security Council and the degree of bilateral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Russia; (2) there is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Sino – Russian cooperation in the Security Council and the strength's widening gap between China and Russia. (3) there is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Sino – Russian cooperation in the Security Council and the geographical position of a country that legislation passed by the Security Council involved.

Labour Migration of Central Asian States in Russia Ji Xiang and Guo Xiaoqiong

Based on data of the Russian Federal Migration Service and Rosstat statistics related immigration , this paper carried on the induction and consolidation of labor migration of Central Asian states in Russia , including the number , the country , gender and age , education level , the industry and regional distribution. The paper also analyzed mutual impact of labor migration of Central Asian states in Russia on the host country and source countries. Finally the main direction of Russian immigration policy and adjustment trend are predicted.

De – Russianization Process in Uzbekistan

Wu Airong

In the early 1990 s Uzbekistan has started de – Russianization on a large scale in various fields of social life , in order to highlight its national independence. This article tries to find out reason why Uzbekistan wants to de – Russianization , introducing its measures and evaluating the impacts of de – Russianization on the position of Russian language , its using scope , and Russians' life situation. Using and development of Uzbek language have important influence on country's culture , education level , economy and national psychology.